

#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 人 物 传 记

### 第 九 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中 华 书 局

1980年10月



B007183

K255  
6  
229

#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 人 物 传 记

### 第 九 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 华 民 国 史 研 究 室 编

(征 求 意 见 稿)



中 华 书 局

1980年10月

A808526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人 物 传 记**

**第 九 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  
中华书局排印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北京体育报社印刷厂印刷

•  
1980年10月印刷

•  
定价：0.74元

##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历史教学、研究工作参考，每辑字数不定。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七、译稿如引用，请核对原文。

## 目 录

|     |                |
|-----|----------------|
| 张 澜 | 宗志文 (1)        |
| 陈少白 | 姜献阁 (8)        |
| 刘揆一 | 李静之 (12)       |
| 范筑先 | 姜克夫 (17)       |
| 赵寿山 | 西安交大中共党史组 (24) |
| 孙蔚如 | 靳英辉 (31)       |
| 唐继尧 | 谢本书 孙代兴 (37)   |
| 刘显世 | 李德芳 (44)       |
| 刘桂棠 | 刘述和 (48)       |
| 张嘉璈 | 江绍贞 (53)       |
| 黄仲涵 | 温广益 (60)       |
| 闻一多 | 王子克 (63)       |
| 许广平 | 张小曼 (69)       |
| 林白水 | 钟碧容 (75)       |
| 李叔同 | 熊尚厚 (80)       |

|     |               |
|-----|---------------|
| 肖龙友 | 寿祝衡 (85)      |
| 施今墨 | 寿祝衡 (87)      |
| 太 虚 | 韩廷杰 (89)      |
| 林励儒 | 郭 焙 (94)      |
| 汤用彤 | 宗志文 (98)      |
| 马约翰 | 王维屏 黄延复 (101) |
| 朱 湘 | 孙玉石 (105)     |
| 史迪威 | 瞿同祖 (109)     |

## 张 澜

张澜字表方，四川南充人，生于1872年4月2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其父张文倬是秀才，在乡村任塾师。张澜从小随父读书，1894年中秀才，不久补廪生。1900年父亲病故后，继父主持塾馆馆务。1902年被选入四川尊经书院深造。1903年以学习成绩优异，被选送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这时，他政治上倾向君主立宪，并参加君主立宪派的活动。1904年在东京中华留日学生会上，他提出西太后退朝，还政于光绪的主张，被清政府驻日公使派人押送回国。回国后，先后任四川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成都游学预备学堂训导长。1906年回南充，创办南充民立两等小学、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及南充端明女学。1909年10月，四川省咨议局成立，南充地方公推张澜出任咨议局议员，他推辞未就；但与咨议局正、副议长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纶是至交，常跟他们一起参加立宪运动。

四川人民为了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早有自办铁路的愿望。1905年四川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名曰官商合办，实则一切由官方把持。1906年末，经四川留日学生要求，川汉铁路完全归为商办，实权则落入立宪派士绅手中。1911年初，清政府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建议以借款为资本，实行铁道国有政策。清政府于5月9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的“上谕”，20日又与英、美、法、德四国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合同”，向帝国主义拍卖铁路权利。清政府的这一劫掠和卖国的行径，激起了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各阶层人民的一致反对。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临时会在成都开会，张澜作为南充的代表出席。会上成立了保路同志会。8月4日，保路同志会召开群众大会，欢迎各府县的代表，张澜上台致答辞，鼓励群众同心协力，为保路废约而斗争。次日开股东会成立大会，张澜被推为副会长。与此同时，清政府又强行接收了川汉铁路宜昌

分公司，并要以川款继续开工修路。于是，自8月下旬起，成都人民开始罢市、罢课，进而实行抗粮抗捐。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藉口谈判，将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的首领蒲殿俊、张澜等人诱人督署加以逮捕。张澜据理力争说：“既然准许四川人民出钱来修筑川汉铁路，断不能说路权不属于出了钱的四川人民”，“既然庶政公诸舆论，断不能说四川人民争取自己的路权是非法。要是出尔反尔的把路权从人民手中夺去出卖给外国，这简直是引狼入室，为害不浅！”①赵尔丰无言以对，拍案大叫：“张澜，你太强横！”张澜凛然不屈。随后，由于赵尔丰的血腥镇压，四川形成了带有全民性的大起义。清政府下令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派兵镇压。端方入川，更加激起四川人民的斗志，整个四川都沸腾起来。张澜等被释出狱。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四川军政府成立，张澜出任军政府川北宣慰使，成立了护卫营，刘湘任护卫营营长。张澜到南充设立了川北宣慰使署，先后与地方人士共同发起创建南充县立中学校、南充实业学校，还创办了南充果山蚕业社，发展实业。

1913年4月，张澜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不久到北京出席会议，由蒲殿俊介绍加入进步党，并参加进步党的活动。6月，进步党四川支部开临时大会，张澜被选为常务员。袁世凯上台后，大搞专制独裁，1914年1月下令解散国会。张澜失望之余，重返四川。1915年任嘉陵道道尹。护国战争打响后，张澜联合驻防川北的第三师师长钟体道，以及川北全部、川西大部武装民团通电响应讨袁，并在南充宣布独立，赶走当地驻防的北洋军。

讨袁战争结束以后，川军形成两个军事系统：一个以依附北洋派的刘存厚为首，一个以拥护西南方面的熊克武为首。张澜是站在刘存厚一边的。1917年11月，北洋政府任张澜为四川省长。1918年初，滇黔军会合熊克武的川军占领重庆，赶走北洋军。2月，熊克武主持四川军政，张澜随同刘存厚出走。不久，张澜到北京居住。

1919年五四运动时，张澜支持新文化运动，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留法勤工俭学进一步开展时，他积极鼓励和支持青年出国留学。

1920年春，张澜因奔母丧回到四川。随后几年，他在故乡南充大力兴办中等教育，联合地方人士成立南充地方自治筹备处和讲习所，创办《民治日



报》鼓吹地方自治。当时川北一带苛捐杂税甚多，张澜曾公开出面号召市民和学生罢市、罢课，抵制捐税，并组织学生下乡宣传，对军阀官吏的贪污横行进行揭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止过一些人的不法行为。

1925年7月，刘湘兼任四川军务善后事宜督办，成为四川军政的中心人物。同年12月四川善后会议在刘湘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成都大学，并决定任张澜为该校校长。

成都大学设文、理、法三院共十二个系和文、理两个预科，学生一度达二千余人。张澜就任校长后，提出“打开夔门，欢迎中外人士来川讲学”的方针。学校除网罗四川各方面有学识的专家来校讲课外，并派专人到省外各地聘请国内外有名的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外语、物理等系先后请有外籍教师二十余人。在思想和学术研究方面，张澜主张学习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榜样，提倡思想、学术研究自由，各党各派兼收并蓄。学校办有《科学思想》刊物，邀请进步人士撰稿，宣扬科学与民主。1927年四川各军先后投归国民党，和蒋介石一起公开反共。此后，四川各学校一律要进行党化教育，张澜不以为然。7月24日，学校出了一张布告，说：“……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②。

当时成都大学社团林立，但主要是三大派：一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二是国家主义派的惕社，三是国民党的健行社。张澜说，他主张各派争鸣。在他的支持下，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发展最快，影响最大。1928年2月，成都反动军警借口学生闹事，制造了二·一六惨案，屠杀学生十四人，其中有成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成员六人。张澜愤而辞职，经全校师生挽留始复职。复职后，他立即派人通知一些离校的进步学生暂缓到校，以免被害。另一方面，他又限定学生在校内只能进行革命理论的研究，不能进行实际的革命活动。但是，国民党特务却连这种研究活动也不许可。他们用各种方法打击张澜所标榜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研究自由，终于迫使张澜不得不于1930年下半年离开学校。

张澜回到南充后，继续办中小学教育。四川连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

小学教师的生活十分艰难。他在《乡居杂感》中曾描述当时教师的境遇说：“乡村学校尽萧然，旧款犹亏新款悬！多少教师饥欲死，还须忍苦待来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国土沦亡，他满怀忧国忧民的感情，又写诗说：“眼前百事尽悲观，薄酒孤斟强自宽。忽念方张华北寇，又令通夜寝难安。”

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四川省主席刘湘奉蒋介石之命进行阻击。与此同时，刘湘成立了安抚委员会，担负安抚流亡灾民的任务，聘请张澜任委员长。红军长征离开川北后，张澜率调查组前往川北一带进行调查。当地农民有口皆碑，无不称颂共产党和红军，使张澜受到很大教育。1935年秋，张澜在成都与邵从恩、卢子鹤等发起组织“四川省乡村建设期成会”，提倡推广乡村建设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澜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与参加参政会的中共代表接触较多，接受了共产党的影响，进一步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张澜对此极为不满，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切实保障民权。他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抗日党派参政员掀起的宪政运动。为了促进统一团结，共同抗日和实施宪政，同年11月，张澜和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重庆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其宗旨为：“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统一，促成行动之团结。”<sup>③</sup>要求在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和法令，应即中止和宣布无效；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这期间，张澜常常在公开场合指摘国民党的各种反动措施。有的特务分子记录他的讲话后，要他签名，他毫无畏惧地说，我所讲的话，我绝对负责。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肆意摧残民主，消灭异己力量，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采取高压政策。从1941年2月开始，各民主党派经过多次磋商，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同年3月中旬在重庆秘密成立。执行委员有黄炎培、张澜等十三人，主席为黄炎培。不久黄辞职，张继任主席。9月18日，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创办的《光

明报》出版，10月10日，公告同盟成立，并发表了十大政纲。张澜代表同盟在重庆招待记者，宣布同盟成立经过及其政纲，说同盟对外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对内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这一严正立场，受到人们的赞扬。

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被迫作出关于实施宪政的决议。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揭露十一中全会关于实施宪政的报告言行不一，戳穿他们的假民主，真独裁。结果这本书被国民党政府禁止发行。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了扩大组织，发展无党无派的个人盟员，以便让更多的爱国和进步分子入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取消“政团”二字，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推选张澜为主席。他在会上提出，民意必须自由反映，党争必须和平解决，关键是要民主。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民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和《政治报告》。张澜在会上提出争取民主团结，反对分裂内战的主张。这次会上，张澜继续当选为主席。12月，他又致函国共两党，对团结问题、民主问题、军事问题及国家建设问题提出了意见，并请国共两党于1946年元旦双方下令停战。

1946年1月，张澜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协协商会议。会后，他为了贯彻政协决议，争取国内和平，极力促进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7月中旬，民盟中委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遭国民党特务枪击殒命。8月18日民盟在成都召开追悼会，张澜在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声泪俱下。散会时，遭特务凶殴，打伤头部。会后记者访问他时，他说：“为了反对发动内战，反对独裁专政，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个人流血算不了什么，我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④11月中旬，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召开一手包办的伪“国民大会”，要通过蒋记宪法，导致国共和谈的最后破裂。张澜在重庆打长途电话给南京的民盟总部说：“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全部实现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⑤后来，民盟拒绝了参加这次伪“国民大会”，并通过决议将背叛民盟立场、参加伪“国民大会”的民社党清除出盟。12月，张澜由重庆抵上海。在民主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会上，他阐明了民盟不参加伪“国民大

会”的理由，强调和平、团结，反对分裂、独裁，并号召扩大和平民主运动，以达到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目的。

1947年1月，民盟在上海召开一届二中全会。张澜在开幕词中说：“我们宁可长期不参加政府，而断不可一旦失去自己的立场。”在闭幕词中，他又号召民盟成员“把已被蹂躏的政协精神复活”，“继续为政协精神而奋斗”。这时，国民党一方面疯狂地进行反革命内战，一方面在其统治区加强法西斯专政，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民盟被诬蔑为“奸盟”，各地民盟所办报刊全部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一部分盟员和地方负责人被捕被杀。因国民党迫害加剧，民盟中央领导成员间的意见愈加分歧，有些人倾向妥协。10月下旬，国民党政府的军警包围了民盟南京办事处，同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5日，民盟总部被迫声明解散。7日，张澜发出呼吁，吁请民盟盟员在合法范围内，继续为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而努力。

1948年1月5日，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在香港主持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紧急声明，否认民盟总部发表的解散声明，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宣言，公开声明要“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sup>⑤</sup>。会议还决定主席一职暂由沈钧儒、章伯钧等中央常委轮流代理。这时张澜在上海也积极募集经费，支援香港民盟总部的活动。同年冬，张澜因病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1949年3月间，张群奉蒋介石命，到疗养院劝诱张澜追随蒋介石，张澜严辞拒绝。国民党武装特务一度冲进疗养院，意欲挟持张澜逃往台湾，张假装病重不走。但从此被软禁在病房里，失去行动自由。直至5月上海解放前，经中共地下组织设法营救，张澜始脱险出院。6月，到北平，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2月20日，民盟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张澜继续当选为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人之一，张澜领导中国民主同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协助人民政府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54年，张澜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了制定宪法的工作，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同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2月9日，张澜因病在北京逝世。

张澜的著作有《说仁说义》、《四勉一戒》、《墨子贵义》。

(宗志文)

注：

- ①《中国青年》1954年第18期第2页。
- 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81页。
- ③《中国民主同盟大事记》第1页。
- ④沈自强：《民盟在成都的一些情况》。
- ⑤同①第8页。

## 陈 少 白

陈少白，原名闻韶，号夔石，1869年8月27日（清同治八年七月二十日）生于广东省新会县外海乡。其父陈子桥是个乡绅，晚年加入基督教。四叔梦南亦为基督教徒，曾翻译西书供陈少白阅读，对他的影响较大。

陈少白六岁起在家课读，1884年以后从族兄心夔、翰周及陈源泉等人读经书，学做八股文。1888年入广州格致书院学习。他擅长文学，能歌赋，会书画，有“才子”之称。因度量偏狭，出语尖刻，往往不易与人共事。

1889年底，陈少白因事赴香港，得区凤墀介绍，结识孙中山。时孙肄业于雅丽士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翌年1月，孙推荐陈亦入该书院学习。此后两人经常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交谊甚深，曾拜盟为兄弟，孙居长，写信给陈时皆以“吾弟”称呼。1892年孙中山毕业离校，陈因不喜医术也辍学。当时与他们同道的还有尤列、杨鹤龄，四人常在一起谈论反清造反，被人视为大逆不道，称为“四大寇”。

陈少白辍学离校后，随同孙中山一道从事革命活动。孙先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和开设药局，陈奔走其间，助孙维持店务。他们寻找救国道路，有民族民主思想，但也受了当时风行的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1894年1月，孙中山写了《上李鸿章书》倡言革新，经陈少白修改后，于6月携至天津求见李鸿章，想对朝政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李不予理睬。孙失望之余，便出走檀香山去联络华侨宣传革命。陈少白帮助结束孙中山遗留下来的药局事务。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革命团体兴中会，即致书陈少白，要他在香港开展革命活动。翌年初，孙抵香港，陈少白及陆皓东、郑士良等人均入兴中会，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sup>①</sup>。同时吸收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赞泰等人参加，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成立了兴中会总部，对外称“乾亨行”以掩人耳目。他们经过商议，决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由

孙中山赴广州担任军务，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邓荫南等佐之，杨衢云驻香港负责后方接济及财政。孙、陈等在广州以农学会的名义设总机关，展开了各项筹备工作，联络广东各地的会党、绿林和防军，决定在10月26日（阴历九月初九）起义。结果因谋事不密，走漏了消息，致使这次起义未及发动即遭失败，陆皓东等人被捕牺牲。陈少白得以脱险，与孙中山、郑士良等东渡日本。

在日本横滨，孙、陈、郑结识侨商冯镜如等，成为同志，并建立起兴中分会，以冯为分会长。不久孙、郑离日，陈少白在日本剪辮易服，取日名服部次郎，助冯镜如编纂英华字典及办理兴中分会事务。同时先后活动于横滨、东京等地，与日本志士曾根俊虎、宫崎寅藏等相识。

1897年秋孙中山复至日本，陈少白与孙中山、尤列、杨衢云等人常以横滨三余轩和修竹庐为游息议事之所，商议扩大革命力量。陈少白曾赴台湾活动，组织兴中分会，但会员不多。翌年他再去台湾，筹得了一些捐款。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逃至日本。日本志士热心促进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和康梁改良派的合作，陈少白代表革命党与康梁等人多次会谈。陈指出：“满清政府已不可救药，……今日局面，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②，劝康等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但因康有为坚持保皇的顽固立场而未果。

1899年秋，陈少白奉孙中山命，到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他在香港租定报馆发行所，由日本购置来机器、铅字，经过数月筹备，于年底出版。这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报纸，陈为报社第一任社长和总编辑。《中国日报》宣传革命思想，发表《民主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等文章，影响较大，针对保皇派报刊上的一些谬论进行批驳，在理论上展开了交锋。该报首次改变从前中文报纸直排长行的惯例，采用横排短行的版式，为后来国内报纸效法。陈少白还主持出版十日刊《中国旬报》。他克服了许多困难，对兴中会初期的革命宣传工作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陈少白还积极从事联络会党工作，为革命积聚力量。他首先加入粤三合会，被封为白扇③，其后又加入哥老会，被推为龙头之龙头④。同年冬，陈少白促成哥老会首领杨洪钧、张尧卿、李云彪等到香港，与兴中会、三

合会领导人会晤，并于翌年春在港召开联合大会，决定共同组成兴汉会，选孙中山为总会长，而陈为实际主持人。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八国联军大举入侵，东南各省政客谋求互保。英国政府香港当局有意策动两广总督李鸿章“自主”，派人与陈少白秘商，希望孙中山的革命党与李合作组织“独立”政府。孙、陈等赞同此策，致函港督提出平治章程。结果因李鸿章北上，合作尝试落空。此后，革命党便加紧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同年夏，孙中山两次乘船至港，召集陈少白、杨衢云、郑士良、史坚如等人在船上开军事会议，决定在惠州和广州同时发难，由陈等在港负责接济。《中国日报》社遂成为起义的大本营，党人出入络绎不绝。后起义失败，不少义士逃到香港，陈设法予以安置。

由于起义和善后用款较多，《中国日报》社的开支十分困窘。1903年《中国日报》并入李纪堂办的文裕堂印务公司，陈为公司经理之一，仍负责报务。1904年，陈针对保皇派徐勤在香港出版《商报》散布的保皇扶清谬论，以《中国日报》为阵地与之斗争，发论十数篇进行批判。

陈少白在主持《中国日报》、《中国旬报》的同时，与程子仪等创办天演公司，开办彩南歌戏班，招收青少年学员加以训练，排演《文天祥殉国》等新戏，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此后，陈同戏剧界继续保持联系，辛亥革命前夕帮助黄咏台等组成香港振天声白话剧社，亲自为剧社编写《自由花》、《赌世界》、《鸣不平》等具有爱国主义和反封建内容的剧本演出。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即派冯自由、李自重赴香港，与陈少白等共同商量组织香港同盟分会。他们以兴中会为基础进行改组，吸收新同志参加，于秋冬间正式成立，会所设于《中国日报》社。众举陈少白为分会会长，郑贯公为庶务，冯自由为书记。香港分会一向兼管西南各省党务军务以及联系海外交通等，分会长一职责任重大。

这一时期，陈少白的革命活动相当广泛。他在反对美国取缔华工苛约的抵制美货运动中，任香港各界拒约会的顾问和谈判代表。他支持港商陈席儒、陈廉虞、杨西岩等人组织的粤路股东维护路权会，反对粤督岑春煊将粤汉铁路收归官办的决定，在《中国日报》上仗义执言，并常常亲自为该会撰写计划、文



电，倍受赞佩。

1906年8月，文裕堂印务公司破产，《中国日报》社改组，陈少白辞社长职，由新股东推冯自由为社长，陈仍负监督之责。陈同时辞同盟分会长职，亦由冯继任。

陈少白此后热衷于经营事业。1908年他因维护粤汉路权获得酬金九千元，便以此款在九龙牛池湾购置田产十余亩建农场，并筑房屋移家居住。1910年他又任香港商工局顾问及四邑轮船公司司理。1911年武昌首义，广东独立，胡汉民为都督，任陈少白为外交司长，但他不愿做官，几个月后即辞去。不久，他发起组织粤航公司，被推为总司理，收回外人所租码头一座，购买法轮两艘，航行于广州香港之间。1915年他又与李煜堂设立上海保险公司，任主席。1919年粤航公司停办，他买下了该公司所余联兴街口之大码头，后来他到广州时，多居于码头事务所。

孙中山于1921年5月重返广州就任大总统，聘陈少白为总统府顾问，同时应聘的还有尤列、杨鹤龄。孙中山令广东当局重修广州越秀山文澜阁，供陈、尤、杨居住，称“三老楼”。同年10月，孙赴广西准备督师北伐，陈随行襄助有关事务，但不久即辞职回乡。

1922年以后，陈少白在故乡新会县外海乡任民团保甲局长、乡事委员会主席、乡长兼新会第四区区长等职，热心于整理乡政、兴修公路、筹办中小学等乡事建设。他曾遍游南北各地名胜，吟诗写字，1929年著述《兴中会革命史要》一书。1934年秋因病至北平休养，12月23日去世，终年六十五岁。

(姜献阁)

注：

①郑东梦主编：《檀山华侨》，檀香山1929年出版，檀山华侨部分第30页。

②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文化出版社1941年版，第86页。

③白扇是三合会要职之一，为该会的军师，有设计指挥之权。

④龙头是哥老会山堂的首领，龙头之龙头即首领的首领。